



邓小平建党学说

张 中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邓小平建党学说

张 中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安泰

装帧设计：彭放

责任校对：晋存真

邓小平建党学说

张中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75×1270 1/32 印张：43.25 字数：1150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7—5367—1338—X
D·105

定价：85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作者简介

张中，男，河北新河人，1930年生，1943年随父亲张同茂（新河县抗日游击八中队长）入李家庄（董振堂同志故居）新河抗日游击高小学习。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共产党员。曾先后在冀南建设学院师范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党史研究生毕业。后做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从事党史和党建教学多年，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党的建设学科学术带头人、党建学科评审组长、校教研职务评审委员、全国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学科评审专家等职。

主要专著：《毛泽东建党思想讲座》、《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增强党性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素质》、《论党的干部建设》、《党的领导与决策》、《毛泽东建党学说》；合著：《共产党员修养讲座》、《四项基本原则通俗讲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党的学说论集》、《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学习纲要》、《党的领导概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读本》等15部；主编：《党的建设知识手册》、《党的领导基本知识》、《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第三篇、《党的思想建设》卷、《毛泽东思想研究全书》第三篇《思想领导》卷、《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指南》、《党政机关党员培训教材系列丛书》、《党政干部教育丛书》、《新时期社会主义教育丛书》等5套；曾发表论文、诗歌、文艺通讯300余篇；曾在50年代合著中篇小说《模范夫妻号》等著作。

被选为北京市群英会代表、先进工作者；荣获中央党校从事教育工作30年《荣誉证书》、荣获中央党校教学科研工作二等奖《荣誉证书》、荣获中央党校《优秀共产党员》证书、荣获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享受国家级突出贡献特殊津贴《荣誉证书》。

序

汪家镠

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同中国执政党的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它既坚持和恢复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精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动党的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教育、武装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对于党在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执政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怎样认识新形势下党的地位和作用；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党的民主集中制怎样严格执行；党的基层组织怎样进一步发挥战斗作用；如何抓好新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以及如何全面提高党的干部素质和培养提拔优秀的接班人等等。这些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以解答。党的干部和党建理论工作者都要认真学习、研究邓小平的党建思想，特别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当前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给以科学的说明，并推动实践的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张中教授撰写的《邓小平建党学说》，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来论述邓小平建党学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阐明邓小平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把既要坚持继承，又要发展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信张中教授在这一学

科领域积极有益的尝试会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全面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关于党的学说的科学理论体系有帮助。也希望我们党建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拿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1995 年 8 月 22 日

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前 言

邓小平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继承人和捍卫者，是一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光辉典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不仅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上完整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且能够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并不断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思路，新的语言，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 15 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又去指导伟大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

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15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党的历史证明，党要领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伟大的成果，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自己的道路。能不能做到和做好这一点，是衡量党的领导成熟和卓有成效的最重要标志。我们党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成熟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善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一理论，以及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探索勇气、创新精神和非凡战略，都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建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性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在当代中国，有了这面旗帜，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①

事实也正是这样，15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党举起了这面旗帜，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果说，“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么，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道路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走下去，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指南。

为此，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在1993年9月出版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

^① 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第4页。

三卷的决定》。要求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要联系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致力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要同学习他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结合起来，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胸襟开阔，通观全局，勇于创新，开拓前进。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

我们党形成和发展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成熟领导集体不是偶然的。早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选出了17名政治局委员，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七大”时选出的书记4人，增加了比较年轻的2人。党的“八大”继承了“七大”选出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并有新的成分加入，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作了准备。

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预备会议上，就强调指出，这个名单的结构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提出的新的要求。党的“八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主席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虽然也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总理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军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毛泽东同志还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他的谈话中和周恩来同志所作的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了名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这就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毛泽东同志也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毛泽东主席对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多次进行批评。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这党和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采取了解决高层次干部问题的决策和重大措施为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1973年10月提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

端，对邓小平同志发难进行攻击。邓小平同志理直气壮，严正地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和责难。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带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有。”还强调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主席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形成和发展成为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民的新的希望。

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革命气魄，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敢”字当头，进行全面整顿，大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左”的和右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过了曲折和反复，毛泽东主席也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一度动摇了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决定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搞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做，由于违背了事理，违背了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抵制。而对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邓小平同志获得了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粉碎了“四人帮”的政治阴谋和反革命活动。实现了

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支持。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引下，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这就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创造新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我们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顾委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1980年9月以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虽然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们和叶剑英同志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重要作用。这已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成熟领导集体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载入我党

史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发展，在党的建设上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本来面目；批判和抵制了否定和歪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言论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坚持、捍卫、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理论和原则。同时，邓小平号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探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理论、原则，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和科学论断，形成了邓小平建党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思想体系。邓小平建党学说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已成为团结全党为实现新时期宏伟目标努力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

几十年来，我们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充分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建党学说》一书，研究和论述了邓小平建党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和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原则和方法，论述了邓小平建党学说的基本特色、独特思路及重大贡献。邓小平建党学说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毛泽东建党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邓小平建党学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具体体现，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智慧的

结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党学说的基石，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建党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建党学说科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对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制度、干部、军事建设，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建设等等，都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和新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建党学说的地位和作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邓小平建党学说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而产生，随着党的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它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主观的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它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历史使命以及建设党的根本途径、方法、措施等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首先，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党情、民情为依据，思考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着重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其次，依据党章、条例、决议、决定，从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出发，反复强调坚持从严治党、治国、治军，采取断然措施防止党内腐败变质的危险。其三，坚持党的建设工作的经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本领、建设本领和治国本领巩固执政地位。这些思路的形成和发展使邓小平建党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个独特思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邓小平建党学说指导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党的整个工作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另一方面，它引导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来进行，保证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实现。这就从总体上保证党的建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发展，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邓小平建党学说也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最早一批党员和政治活动家之一。他从去法国勤工俭学到举行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他一直长期担任党内外各种领导职务，为邓小平建党学说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他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先后担任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中央组织部长、秘书长等职。从党的“八大”起，他担任党的总书记长达10年之久，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主席等职务。因此，由于他长期处于这些重要的领导岗位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使邓小平同志能够从全局的角度观察和了解党的状况，探索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积累了丰富的建党经验和建党学说。这一条有利因素与他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素质相结合，就成为他在党的建设理论作出建树的重要客观与主观条件，形成了邓小平建党学说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建党学说》一书还阐述了邓小平建党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

首先，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这既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经验，也是新时期邓小平建党学说获得新发展的重要原因。其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成熟领导集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无产阶级经典作家的条条框框，也不受各种政治思潮、政治理论的冲击和干扰，有自己的理解、认识和主张，具有远见卓识和正确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其三，对党、对阶级、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敢冒风险，引导全党奋力冲破“左”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不计较饱受极“左”错误之苦的个人恩恩怨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引导全党正确地评价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能坦诚地承担在社会主义事业发生转折时期自己所应负的责任。显示了一个政治上高度